

## 虛度八十年

我出生於安徽省安慶市濮家孝子坊濮家大屋。據說牌坊是明朝神宗賜立的。篇上有皇帝的墨寶“以孝傳家。”城外農莊上有濮家祠堂和家墓。記得小時每有佳節，隨著家人到祠堂去祭祖，看到大人們跪在高掛在正廳上的一面木版前，燒香祈禱，我問父親：“版上寫的是什麼呀？”他說“天地君親師”我又問“為什麼要向他們拜拜？”他說

“天，給我們生命；地，給我們食住；君，給我們安全；親，給我們愛護；師，給我們教育。我們從生到死全靠他們的保佑。”當時我聽來只是一知半解。後來長大了知書達理了，我對儒教的哲學還是半信半疑。只到最近聽到 OBAMA 總統的競選辭後，我才恍然大悟。他說

“You don't own your success , It belongs to all the people who helped you in your life ……”我深深的體會到人生在世如果失敗了，那是你自作自受，如果你成功了，那全靠天時地利人和。我們這群台大老校友能來到華盛頓開早期校友會，都可稱為壽翁福婆。回顧人生的道路上的確有無數的人給我們一臂之力。現在我們能夠很快樂的走近終點，我想借寫回憶錄的機會向我的天地君親師表答我所感受的恩典。

清朝末年國弱民窮愛國青年紛紛參加革命運動，推翻滿清後，年輕人有些加入國民黨，有些加入共產黨，兩黨有時對立，有時合作。我的父親濮德超先生參加了國民黨。他的黨員證上注明是“徽字第六號”。他一生忠黨愛國，在政治界，在教育界盡了他最大的能力。他的弟弟濮德志先生參加了共產黨，在安慶從事地下活動，往日的濮家大屋是

今日的共產黨安徽紀念館。他們的表兄陳獨秀先生在北京組織共產黨，從此種下了國破家裂的幼苗。

我的母親生長在一個封建的家庭中，他們認為“女子無才便是德”，母親自強不息，她爭取了新式教育，做了一生的小學教員。我的父母用公教人員的待遇培植了十個兒女是非常辛苦的。我家的生活談不到物質享受，但是在精神教育上我們子女確實受到豐富的支持。記得在中日戰爭時我家搬到離重慶五十裡外的一個小鎮青木關。父親在教育部工作。部長陳立夫先生常常派父親到各個國立中學去視察和督學。每天晚飯後母親把一盞桐油燈放在飯桌的中心。她改卷子，我們兄弟姊妹圍桌做功課。我們考到九十分，她還是不滿意。她要我們“止於至善。”她提倡男女平等，因為社會上還是重男輕女，她對女兒們的鼓勵特別的加強。她常說“上帝對兒童們是公平的，他給每人每天 24 小時，纨绔子弟用他們的時間培養壞習慣，你們窮家兒女就有時間努力讀書，走上人前”她從來不打麻將牌，從來不看京戲。她把一生的精力都放在兒女身上，我們子女能夠成長在中國國難中能到美國安居樂業，怎能不感激她的苦心和勞力！

當我讀青木關小學二年級時父親曾帶我上重慶市去見見市面。星期一早上他到中央黨部做紀念周，他把我放在禮堂樓上的閱覽室中看書。我看到一列汽車開到門口，首先走出一個披著黑披風戴著軍帽的人。頓時鴉雀無聲。會開完了以後我問父親：“那個人是誰？”他告訴我：“他是蔣委員長，他偶而來給幹部們訓話。恰巧給你碰上了。”我問：“他是幹什麼的呀？”父親很隆重的說：“他是中國的首領，我們要

打倒日本，全靠他的領導。”父親對蔣先生是衷心崇拜，不管中外輿論如何，他堅持認為蔣公是中國的救星，人民的恩主。我也認為在中國的近代史上蔣總統是一位不可忽略的偉大人物。假如沒有他領導我們戰敗日本，中國人的境遇真是不堪設想。

日本軍閥說三個月可以征服中國，但是苦戰四五年，東上不了三峽，北過不了劍閣，他們改道由華南打往重慶，廣東廣西變成了他們的屠場。蔣宋美齡爭取了經費，又在美國募捐來一批物資，開辦了十幾個保育院教養戰爭孤兒。1942年陳立夫部長派我父親創辦國立第二十中學，收養教育年長的保育生。父親選擇湖南芷江城外柳樹坪做校址，容納了三千學生，沿著江岸建了七個分部（校總部、高中部、女生部、第一第二初中部職業部和小學部）校總部借用一座古廟，依山臨江父親在圍牆上親自寫上“以校為家，以身許國”八個大字，我進入了小學部四年級，早上升旗時同學們唱保育院院歌“我們失去了爸爸，我們失去了媽媽，我們失去了土地，我們失去了老家，我們的大敵人就是日本帝國主義，我們要打倒它，打倒它才可以見爸爸和媽媽，打倒它才可以建設新中華。”父親對學生訓話時總提醒他們：“中國這麼窮，但是在困難中付出一筆鉅款撫養你們教育你們，因為你們是中國的前途，將來你們一定要報答祖國。”果然在政府召集遠征軍時很多高中學生投軍從戎。當父親送一卡車一卡車的學生到前線打戰時，他揮淚致別，因為他知道很多人不會回來，那年底我們收到通知我的哥哥濮本林也參軍了他被送到緬甸參加聯軍陣線，後來又聽說他在印度醫院療養，全家都為他擔心，只有燒香拜佛希望他平安回國。

抗戰勝利了，世界第二次大戰結束了，謝天謝地我哥哥也回家了。我們全家隨著中央政府回到南京，父親在中央黨部工作，母親教珠江路小學，哥哥、我和妹妹濮易進了中大附中。我們不單不繳學費，連住校吃住也是政府付給，校園很優美，教師的程度都是全國最高尚的。同學大多是中大教職員子弟和政府要員子弟，我們能在如此可貴的環境中學習實在是非常幸運。可惜好景不常，三年後，內戰爆發，我家又隨著政府逃到臺灣，我和易妹入台中女中高一，高中教育是最重要的關鍵，在這段時間，我們要選擇職業的道路，台中女中的教務主任是一位很有遠見的教育家，他認為學以至用，他主辦高二級分成三組，甲組是家政；乙組是文科；丙組是理科。他說：“首先，相夫教子是一個神聖的職業，應該先學教養子女而後嫁，其次中外文化需要繼續發揚，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科學。中國最需要的科技人材，女人的頭腦不亞于男人，如果不利用女人開發理工，那將是中國的一大損失。”我一向喜歡文學，我的作文常常給老師誇獎。高一教國文的華老師兼任報館的編輯，他曾把我的散文登上報紙，我想做個新聞記者，華老師給我很大的鼓勵，所以我打算選乙組，忽然有一天晚上，便衣員警把我們的教務主任和華老師抓走了說他們是“匪諜”。從此不知下落，這事件對我打擊很大，我沒想到寫文章也會招來滅身大禍。因此我決心改選丙組，埋頭苦讀算學物理化學等科，幸好教數學的陳老師和教物理化學的李老師都是教導有方的好老師，1951年我考上台大化學系，易妹考上物理系，丙組的同學要升學的大多考上了大學，直到今日台中女中同學集會時，大家還在懷念高中時所受的美好教育。

四年台大生涯是我最快樂的歲月，也是我最憂愁的歲月，考到了第一志願，心裡非常興奮，台大是臺灣最好的大學，校園優美，教授學生水準都是全省第一。白天上課做實驗，晚上去圖書館，很晚才回女生宿舍休息，在國難重重的寶島上，我有如此的境遇學習進修，使我感到有如“天之驕子。”但是一出校園，我又面對著另一個現實：國軍能保衛臺灣嗎？打起仗來怎麼辦？我家的經濟環境不如往日，生活很艱苦，父親在正中書局當編審，心情不好。他說：“當初在教育界工作，目的是為國育才，同事們互敬互助，學生們更是可愛無畏，我感到生活和工作都很有意義，後來轉進政治界在中央黨部做事，為國為民的政客也有，但一大部份同志爭權奪利互相排擠，國民黨失去大陸就是受了那批狐群狗黨之害。現在進入了商業界，他們的目的是唯利是圖，無孔不入。這些人的品格更是一落千丈。”父親視惡如仇，他曾經揭露過一些奸商汙吏，給自己帶來很多麻煩。母親身體欠佳，她已經不教書了，我看到父母生活困難但無力協助心中總是悶悶不樂，等到快畢業時，我也為自己的前途當心，很多大學畢業生找不到工作，就是找到了工作，工資不會高，眼看著一些高官顯要的子女考不上大學，卻佔據優裕的地位。這樣不公平的社會很令青年人失望。因此我就下了決心到美國去留學。我打算拿到博士學位後回台教大學，如此我可以自立，協助家人，為國服務。

易妹拿到台大徐氏獎學金於 1956 年來美加州大學 (Berkeley) 功讀博士學位，年底我申請到柯州大學 (University of Colorado) 助教獎學金，當我乘船到達三藩市時，易妹來接我，在她美麗的校園內，她指著十

幾位教授曾獲諾貝爾獎金，她說：“這裡的物理系，不單是美國也是全世界最有名的研究所。”我問她：“你可想像得到當年在青木關的兩個鄉下小丫頭，今日能來到美國最高學府攻取最高學位？”她說：

“我們生活在夢想以外的佳境，謝天謝地，也該謝謝我們的國家和父母。”我說：“在家時不覺得，一旦走出國，就感到親情似海，當家人站在基隆港碼頭向我揮手道別時，海風吹亂了母父的白髮，我忽然領會到他們已經衰老了，我們要努力讀書，不能使他們失望！”

柯大在海拔一英里 Denver 市外的 Boulder 小城，在 Rocky Mountain 的山腳下，校園非常幽美，附近的居民也非常友善，使我奇怪的有兩件事：第一，當我報到時，學校當局要我發誓簽字，說我不是共產黨絕對不做反美工作。我說：“在臺灣也沒有人要我如此做，美國是民主自由的國家呀！”當局說：“每個教職員都得有此手續。”於是我只好從命。第二件事是如此大的學府我只找到兩個中國人。一個來自香港，不會說國語；另一人來自日本，一身日本人的怪氣。原來在韓戰時聯邦調查局(FBI)在柯大逮捕一批共產黨，包括物理系名教授 Frank Oppenheimer, (他是原子彈之父 Robert Oppenheimer 的弟弟)，從大陸來的中國學生，有的進了監獄，有的驅出國境。我孤苦零丁在這陌生之地，連一個會說中國話的人也找不到。好在我功課忙教書很累，我也沒有時間來自怨自憐，第三年我已通過大小考試，只剩下法文德文和論文三大關，我參加了外國學生會，希望能遇到同學可以練習我的德文或法文，在一個晚會上碰到一個從菲律賓來學商的男生，他的名字是 Benjamin Parungo，我對他的第一個印象是這人看來很順眼，第

二是他的談吐不俗氣，我們常常結伴去舞會，去滑雪，有一天他問我：

“你畢業以後打算如何？”我說：“我想回臺灣教書，幫助我父母，為祖國服務，你呢？”他說：“我的家人花了很多錢送我來留學，我有義務加回去幫我們做生意，等我賺了錢我想在 **Manila** 海邊造一幢房子每天工餘回家，兩三個孩子和一隻狗衝出花園來迎接我，進門看到一個如你一樣美麗的妻子等我吃晚飯。”我說：“你的憧憬很可愛，我的理想也很高尚，可惜二者南轅北轍，無法想像如何參合。”他說：

“事在人為，我們還有一年時間，我要設法盡力說服你。”他對我的表現的確很好，害得我意亂情迷，但是他沒有說服我，我也沒有說服他，到畢業時雙方撤兵議和，放棄往日的夢想聯合創造新的生活，結婚以前我們談的是風花雪月，很少有異見，結婚以後我們談的是油鹽柴米，這才發現各有各的胃口，再加上我的父母對我的婚姻很失望，他的家長對我們很反感。我們新婚並非燕爾，直到我們有了三個孩子，大家才放開主見，統一為下一代謀福利，我們曾拖兒帶女回鄉省親，長輩們也曾來美國歡聚一堂，享受天倫之樂。

我的論文指導教授 **Dr. Stanley Cristol** 是有機化學界的名人，很多學校或化工廠需要人材時常找他介紹門徒，**1962** 年美國新成立了一個國家大氣研究所（**NCAR**）位址就在 **Boulder** 的城的山上，**Dr. Cristol** 推薦我去此就業，這裡設備新穎，經費充足，同事都是來自全球的學者，有天文家，地理家，數學物理化學家等等，並有世界上最大最快的電腦。覺得很幸運有這樣好的機會來開始我的事業，但也感到很謙虛，因為大氣化學不是我的本行，很多知識要從頭學起，自從十九世紀工

業革命以來空氣污染在歐洲已成為很嚴重的問題，他們對這方面的研究已先人一著，因此我曾被派到英、德、法、義大利等國考察學習，我們合作研究的結果曾在大氣科學等文獻上發表，因為很多學者報告空氣污染不單傷害人類和動植物的生命，並且可以影響氣象和氣候，美國政府創立了環境保護局（EPA）立法限制工廠煙囪排泄有害的氣體和灰塵，各大城市的空氣因此清潔多了，酸雨問題也減少了，由於工廠要花錢改良設備，大公司營利受損，大亨們反對，他們捐款助選共和黨上臺，當 Nixon 當選總統時，他大減 EPA 和 NCAR 的經費，我就職的化學組關了門，我只好另謀他職。

我在國家海洋大氣局（NOAA）的環境研究所工作了二十五年，NCAR 是學術機關，多半是紙上談兵，NOAA 是實用機構需要表現實菓。我參加的第一個工作是改良氣候。我們用化學藥品播散在烏雲裡增加降雨率，我們發現碘化銀、乾冰和一些有機物很有效，但是用實驗室出來的結果用飛機或火箭把藥品散入天然的雲霄中卻需要很多機件和技巧，再說成本不能超過利益，美國的政客都順從民意測量，農人滑雪場愛雪愛雨，建築師高爾夫球員反對，於是政府停止此計，我們十年的勞力也隨風而散。

八十年代美、蘇冷戰進入尾聲，雙方交換學者，一批俄國氣象家來我們局裡考察，我們開誠佈公，有問必答，我們去蘇聯時很多地方不讓去很多設備不給看，問他們學者總是一問三不知，他們說話很謹慎態度很嚴率。主客都知道接待我們的俄人中有 KGB,彼此都很小心，但是在晚會上幾瓶伏特卡酒下喉後，他們的學者也能說善笑，這次訪問的



經驗使我感到在自由的國家工作是多麼的幸福可貴。

墨西哥大學的大氣研究系請我講學有關酸雨的形成，因為很多 Maya 文化古跡逐漸被酸雨蝕化，當時墨西哥城人口一千萬，治安不好，空氣骯髒，我和墨大教授合作測量空氣污染的程度，長期記錄二氧化硫和氧化氮的濃度，因為這些氣體散到雲霄裡，就會氧化成硫酸和硝酸，NOAA 的人員和墨大師生曾在墨國海軍軍艦上合作測量酸雨的分佈，從 Galveston 出發，沿著 Gulf of Mexico 海岸南下然後北上回美，我們把測量的結果呈報墨國政府，並建議如何改善酸雨的問題。他們的領導人物一無遠見；二無財力去執行，一直到今天空氣污染和酸雨仍然越來越糟。自從北美自由通商（NAFTA）協定後，美國、加拿大、墨西哥貨物來往，不納稅，美國很多大公司搬到墨西哥，一來勞工便宜，二來沒有環境保護的管制，公司的成本可以減少，利益運回美國，污垢留給墨西哥。孰不知污染不識國界，今日在墨西哥明天就吹到加州和德州，這樣嚴重的問題不是一國可以解決的，地球是人類的家園，我們這一代不清理保護它，我們的子孫就可能無家可歸了。

七十年代中國大陸與美國建交，兩國交換學者，1979 年我參加了美國環境保護學團去大陸訪問，離國三十年能回到我生長的故鄉使我非常的興奮，我們由北京到南京上海等城然後廣州到香港再回美國，二十多天，所見所聞使我非常失望痛心，城市鄉村都很破爛，人民生活也相當的艱難，科技設備落後，空氣污垢環境保護政策是有名無實。這三十年間歐美各國科學發展很迅速，人民的生活也大有改進，地大物博人眾的中國好像開了三十年倒車，十九不如我離開時的情景。

八十年代中美訂約合作海洋大氣研究十年，中國海洋局供給海船，美國 NOAA 配給儀器，雙方人員在太平洋上測量大氣和海水流動的變化，我申請到一筆研究經費，聘請了幾位中國學者來美工作，並派了一隊人員上船合作測量天然沙塵和人造的污染，由中國大陸播散到海洋上的旅程。每次出海是一兩個月，每年一兩次。測量結果報告中美政府留下了空前的紀錄。在這十年內我曾被請回國六次去講學，每次回去都很驚訝他們在建築上和商業界的發展。他們的教育改良和科學進步也是日新月異。一個衰老的中國忽然躍進到二十世紀。可見英明的政治領袖可以強國富民，我希望中國多多產生賢能的政治家從此走上宏運。

NOAA 有一組專門記錄空氣中二氧化碳 (CO<sub>2</sub>) 的濃度。因為 CO<sub>2</sub> 和少數其他氣體有阻止地球熱能散出的可能。在工業改革以前，它的濃度一直保持平衡。近百年來因為燒煤和石油產生大量的 CO<sub>2</sub>，它的濃度日漸增加，因此地球表面上的溫度也會逐漸提高。NOAA 在夏威夷，南極和 Samoa 島的山頭上有測量 CO<sub>2</sub> 的站。聯合國建議在中國原始的高山上也立一站，中國氣象局選擇了青海的一座海拔三千八百公尺的山頭。NOAA 供給儀器訓練人員。1994 年該站開幕典禮，他們邀請各國協助人士來參加慶祝，我帶了易妹去參加。會後當地人士請我們去旅遊。黃土高原大好的江山，廣大的沙漠，樸實敦厚的人情給我留下難忘的回憶。

我的工作需要常常出差。我丈夫經營一個小工廠，他也經常出城跑生意，我們約好應有一個人留在家裡照顧孩子們。三十多年來我們所有

的計畫都以他們的福利為主，他們大學畢業了，成家立業了，老伴說：

“我們的責任已盡到了，我們也該退休了，今後要為自己計畫。我想在 Manila 城外海邊買一幢房子。我們去那兒度蜜月晚年吧！”我說：

“菲律賓夏天太熱，冬天住那兒，其他時間還是留在美國，撫吻孫兒孫女也是人生一大樂趣。”可惜我們的美夢未能實現，他不幸得病逝世了。我不願呆守空巢，常常去訪問親戚朋友或結隊遊山玩水。我也愛參加台大早期校友會，和老同學敘舊有如返老還童。有人說美國的老人們是三等公民（等吃等睡等死），我倒覺得家內家外沒有一點責任真是一身輕鬆。

我虛度八十年，也可冒充福壽雙全，我生為一個平凡的女人，活在一個不平凡的時代，謝天謝地我能逃避了不少天災人禍，父母給我無限的恩愛，師長們給我寶貴的知識。活在這個自由平等的美國，我有機會用我所學，貢獻我的能力，完成我的任務。我自稱是個很幸運的人。

——完——